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	阎 淮
【人物追踪】	试论“阎淮现象”	张 比
【史海钩沉】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怎样出笼的	徐庆全
【往事非烟】	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	何大明
【亡灵祭坛】	长矛刺入头颅七厘米——人民大学沈士根同学之死	李豫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春秋史笔】

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
——“清华文革研讨会”发言（2016·4·22）

· 阎 淮 ·

题解：本文只企图探索：为什么只有中国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年毛泽东认为“中共建政”和“发动文革”，是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两大贡献，并且对文革更为重视和骄傲。（《毛泽东年谱》2013年）

我的评论：没有毛泽东也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必无“此文革”！（共产党只要搞土改，年轻农民就会参加解放军、中老年农民就支援解放战争，共产党“建政”是迟早之事。还是耳熟能详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得对。）

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领导的、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共性：领袖独裁、官员特权；党内清洗、党外整肃；思想钳制、舆论一律。无一例外，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变异。

那么为什么“中国，且只有中国”发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呢？只因中国具有“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林彪1966年9月18日）。毛确实既异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又不同于中国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任何事件，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外乎：1、事实判断的“是什么”，2、价值判断的“怎么样”，3、发生原因的“为什么”，4、如何再现或者避免的“怎么办”；四个方面。在《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140—173页，我已用三万字如实交代了我的文革“是什么”；对文革“怎么样”的是非评价，社会上分歧极大；随之的

“欲避免”或“要再现”的“怎么办”处方纷纭。本文避开它们，只讨论：文革在中国发生的“为什么”。

下面就是：我这个不论文革是非，不知好歹的伪学者的貌似客观的、没有价值判断的中性分析。

一、毛泽东独断朝纲，决定文革的起承转合

1、文革的发端

1966年，中共“八大”的最高领导、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只有毛一人积极文革、周林二人不得要领地紧跟慢跟，刘朱陈邓四人糊里糊涂就作为革命对象“先后分别”被批判整肃。几十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几百名中委，几千个省部级高管，几个月就沦落成“走资派”这样一条落水狗。

2、文革的继续

1969年初，以刘少奇为首的所有走资派（即绝大多数当权派）都被打倒，全国山河一片红。“九大”的五位常委中：周恩来在1967年10月说，“文革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习仲勋传》下卷3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林彪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也认为文革应该立即结束，需要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迄今所有回忆录，皆如此说，未见反论。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以此批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康生暧昧；只有毛一人坚持继续文革。故，文革史界有“三年文革论”。

3、文革的结束

1976年毛逝世。“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无贬义），毛若不死文革未已。大规模的夺权运动，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文革前的七大常委：文革中三人惨死（刘整死、林摔死、周累死）。毛若像善终的朱陈邓三人，活过九十岁，在座诸公，还想考硕士、读博士，留欧美、当教授、混高工、发小财？做你的中国特色的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吧！

4、文革前即与众不同

危难时期见本性。如果说，大跃进时几乎全党发昏，那么，困难时期就“举世皆醒、惟毛独梦”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在刘少奇支持下，重新设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经过调研，认为解决农村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刘周邓也都同意（七大常委中朱林养病）。但未料到只有毛一人坚决反对，猛批陈云，即党史中的“批单干风”事件。撤了陈只任四个月的“财经组长”，令其闲置四年。文革算旧账，批陈老右倾。（《陈云传》下卷1325页）

二、毛泽东早年经历的刻痕

发展心理学特别强调少年经历对一生的影响。中国古老智慧亦如是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1、知识的局限

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看到毛的话：“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毛泽东的骄傲，中国的悲哀！没上大学，到理工科的中专混，受点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的熏陶也好；没出过国，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待待，沾点民主和法制的洋气也行。（毛讲，没有“正式”进过大学，说法很严谨，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干了四个月临时小工。真遗憾，要是在咱们清华理工图书馆就好了，哪怕只有三个月！可惜毛正在追求的女子的父亲，只能走熟人李大钊的后门。）

2、对下层的同情

毛16岁到邻县湘乡上学，他说：“我比别人穿得差，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对毛影响甚深的是他17岁时，长沙的抢米风潮，饥民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杀。他说：“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毛从小就萌生公平、正义、平等的“民粹”思想，文革时经常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3、反智倾向

43岁的毛在回忆近20年前在北大图书馆的四个月，仍耿耿于怀：“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斯诺：《西行漫记》）反右时，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对毛刺激和伤害极大。1964年，毛说“读书越多越蠢”。因此，文革初，毛就拿“学术权威”开刀；文革中，又说只办理工科大学。此乃世界罕见！

三、毛泽东异于各国领袖的思想与实践

1、做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生成，赫鲁晓夫下台后，世界领袖的桂冠唾手可得（兄弟国家领袖皆无此主观奢望和客观能力）。马恩“发明”阶级斗争、列斯“发明”无产阶级专政、毛就“发明”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即是继续革命的实验和典范。兄弟国家谁敢“革那些革过命的命”？（林彪语）“组织行为学”认为：需求产生动机，动机导致行为。在毛泽东诸多需求中，主宰世界的领袖需求，无疑名列前茅，因而产生的彻底改造社会的动机格外强烈，必然导致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反常行为。

2、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

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全世界，在野的共产党基本已经修正主义，执政的社会主义大部分开始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亲密的战友七大常委中，只有林彪表面还可以，刘邓朱陈都是变修了的走资派。为了防修反资，必须打掉走资派、进行文革！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国强民富”列为基本国策，而毛则把“反修防资”放在首位。因此避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荒唐口号只能出现在毛氏中国。残酷无情的斯大林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

3、彻底的民粹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新阶级”，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早有定论，解决方式是民主制度。毛泽东根深蒂固的民粹思想和对现代管理知识的匮乏，对现代政治必是“精英政治”、现代管理皆是“科层制的官僚制”深恶痛绝，极力推崇“巴黎公社精神”。他企图不断发动运动和借助民间力量，约束官僚权力、限制权力腐化，而不是建立制度。

建国后党内第一个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

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毛又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

56年八届二中全会，毛说“谁犯官僚主义，就把他革掉”。

63年5月29日毛著文《论反对官僚主义》，罗列其二十种表现。

63年刘少奇领导了“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四清运动”，64年毛泽东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毛在社教批示中，首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65年毛为“社教运动”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毛创造了“走资派”的概念，并运用到文革。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作了批示。毛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见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毛在文革中，利用群众把绝大部分干部打倒，斥为走资派，再让群众解放他们。我们党员恢复组织生活，也要群众通过。哪个兄弟国家敢让群众斗干部，群众决定党员的命运，即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和党团组织，再重新塑造？只有彻底民粹的毛泽东如此气魄！只有毛在掌权后，还敢号召“造反有理”！

4、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66年6月1日毛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首次提出“扫四旧”。8月毛制定的《十六条》，再次把“扫四旧”定为文革的重要目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哪个国家敢、能彻底破除？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郑重其事地提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文革“大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文革“大立”的纲领。毛泽东对整个社会模式，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此都有构思宏大的美妙设计。这就是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按照马列主义的历史发展五阶段，最初级的原始社会，就产出了分工，粗犷者狩猎、精细者农耕。而几万年后的20世纪，毛又提出削弱淡化社会分工的宏伟的最新指示，并在文革中企图强力推行。文革后七年的“斗批改”，工农兵学员对大学的“上管改”都是“五七指示”的实践。

中学生上山下乡，有人说是为缓解城市就业。我赞同我的法国朋友潘明啸教授的看法，毛的目的真是让中学生接受农民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铸造一代新人。（毛何时操心过就业和经济？）

工人的“八级工资制”，本身就有浓厚的混年头的平均主义色彩，而毛还认为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资产阶级法权”。大寨记“政治工分”，则被推崇为最合理的分配制度。平心而论，毛确实怕贫富悬殊、社会分化，导致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殊不知，这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正在让几亿子民经历“头茬浩劫”！

◇ 结语

我强调文革的毛泽东特质。朋友问：“泽东入水晶棺，文革进博物馆，他和它都将永不重生？”

我的回答是：毛不在了，毛的体制还在，文革的土壤和基因还在，因此，具有文革特征的社会现象有可能、并已重演。2012年“九一八”，全国范围的官办非法游行，“打砸抢烧砍”层出不穷，暴民横行闹市要冲。真是：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那就是没有毛的、但依旧有毛阴魂的文革。当时我断言：文革距我们只有半步之遥！

同样只要毛产生，产生毛的体制健在，克隆、复制、山寨，乃至3D打印小号微型的毛，并非科幻。“红唱黑打”的薄熙来即是！（他太太也害人，何其相似乃尔。）

1983年中组部整党时，我的公开发言被同事记录——“阎淮认为过去的错误，不是个别人的疏忽，而是普遍性社会思潮。文革这样的总体性错误，还可能发生。尽管整党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践证明现在的干部制度不行，所以要改革。任务繁重，道路漫长，切不可盲目乐观！”（崔武年：《我的83个月》，40页，高文出版社，香港，2003年。）

文革发生有诸多原因，即学理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本文略去其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众）原因，只对其中必要条件，即缺它不可的领袖特质，进行肤浅地探讨。妄图解释为什么只有中国产生世界上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被发动它的党正式定性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须知，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近万年文明史中，浩劫能几何？半个世纪前，我们有幸或不幸亲历了，当年太愚蠢：五十年后，头秃胡白、耳背眼花，一把年纪，终于明白点了。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敢干点嘛，总可说点啥？！于是，就垒出这些字。

（作者简介：阎淮，男，1945年生于江苏淮安。64年进清华工物系，次年入党。毕业分至甘肃，煤炭系统12年。82进中组部。风波后辞国退党，游走欧美亚从事时政研究。

2017年出版回忆录《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认同普世价值，中国公民美国绿卡，今后主要居住在祖国。）

◇ 讨论帖选登

▲ 吴学民：阎淮兄以他特有的文字风格勾勒出一幅毛的素描画，我觉得是形象而准确的。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作为亲历者的我们至今仍念念不忘，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文革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历程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想还有就是那时我们很多人都深受毛的思想和理念的激励而疯狂过。我认同毛发动文革除了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有理想主义色彩，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学生会义无反顾地追随他。

▲ 王克斌：老淮文章按历史事实一步一步论述了文革的发展过程，有说服力。文革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基础就是毛自1949年经过一系列运动奠定的，同时一步步把他神化。我认为除了毛自己，四人帮和文革小组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包括林副主席。从大处着眼，文革的根源在制度。追究个人责任，毛当仁而不让。

▲ 陶世龙：我看回避反思文革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文革不是毛一人之错。516通知是大家都举了手的，文革中老干部紧跟毛的也不少。

▲ 陈中平：很喜欢读阎淮兄的文章，时而亦庄亦谐，引人入胜，有纪晓岚之风；时而流畅明快，如行云流水，令人流连忘返。

本文描述毛伟人的个人特征，开辟了一个解读文革的独特视角。吴学民说老淮勾勒出一幅毛的素描画，是很贴切的。

关于毛个人经历的影响，作些补充。由于毛经历的局限，影响了他的视野。不但不如张闻天和周、邓，甚至不如朱老总。满脑子改朝换代宫廷斗争结合马列，形成他唯阶级斗争的历史观。

除了青少年时期，中年的经历，特别是延安整风，奠定了毛在党内的至尊地位，也成为他“整党治国”理念的试验田。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乃至文革，都有整风运动的明显痕迹。只是具体对象和斗争策略与手段有所不同罢了。

但是文革这一把玩得太大，虽然他依然乾纲独断，却很难从心所欲。1967年全国武斗，武汉事件已有失控的征兆。九大以后本该见好便收，但庐山会议手下两大权力集团的争夺，导致913事件，后果与代价是巨大的。

毛开始走下坡路，他只能见招拆招。周占了上风，就用批林批孔来批周，并以邓代周，邓不听话就批邓，他已经欲罢不能了。四五运动，就是一出“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大戏。

这种局面长期拖下去，国家民族损失太大，也成为他个人的悲剧。

▲ 王铁藩：闫淮文亦庄亦谐有理有据，耐看。指出毛神“做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尤为中肯。要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中国的赫鲁晓夫，真太小看人了！毛帝王情结由来已久（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而且没有止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取得政权后，与斯大林多有不快，根子也在这里。斯大林被涂鸦后，毛兴致大增。他根本不把蛮夷赫鲁晓夫看在眼里，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经济远远落后。故而毛在经济上一再加码，大搞跃进，与行政官僚们发生了矛盾，并愈演愈烈。转而演变到政治上的裂解，文革就此应运而生。文革在国内录羽。但就世界性的防修反修却成绩卓越。邓大人该出手时就出手，以致墙内开花前墙外香？——这场悲剧与文革不无关系。此外，阎文另一特色是，我说我理，不招三惹四。对于文革这样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话题，不针锋相对好。

▲ 冯钧：拜读阎学长大作，感觉对毛分析得很精辟。我感到还要补充二点：1、毛有强烈的帝皇情结，来自长期的儒家教育，从未接触西方思想。毛自比超秦始皇，推崇武则天，唐宗宋祖，延安时期与丁玲大谈三宫六院等等。在七千人大会上，刘竟敢当众顶撞他，大大冒犯了毛的帝皇心理，害怕大权旁落，这应该是毛发动文革反刘邓的重要因素之一。2、毛熟读《资治通鉴》，精通帝皇权术，抗日时期统一战线，反蒋期高举民主自由大旗，反右期引蛇出洞，对海瑞评价出尔反尔，对红卫兵先拉后压等等。

▲ 陈长坤：@闫淮：好文章！文革是毛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毛将他的毕生精力投入文革之中，将文革作为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至死都在担心他的事业后继是否有人。毛自比为当代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强一万倍。毛之所以要发动文革，彻底颠覆他所创立的中共政府架构，除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权力争斗，也有他的理想所在。文革中毛封为四个伟大，但最后，毛自己只要保留一个，即伟大导师，这也就是毛的自信。毛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也就是毛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而文革就是达到这条道路的重要形式。所以他甚至不惜提出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全然不顾全国的混乱，不顾百姓的生活，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大笑柄。1981年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但却保留了毛的地位，将他与林彪、四人帮切割。当时也许有他的理由，但也埋下了隐患。当今为维持政权的合法性，比邓走得更远。提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提倡学习毛著作、毛思想，理论上的大乱。如果用毛思想，用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无疑会让人感到毛的预言何其正确：走资派正在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走资派的矛盾，文革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难怪现在会有这么多人怀念文革，怀念毛！

▲ 王嵩梅：阎淮这篇文章视角独特，鞭辟入里，抓住了本质。事实上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中国的政局始终被玩弄于毛的股掌之中，偶而有哪个人或哪拨人要挑战毛的权威，毛都会使用手腕将他们挤压得粉碎。文化大革命是毛运用手腕的极致，不仅把中国人民，甚至把其它一些国家的政党和人民都忽悠了起来，以达到他的“理想”，他的目的。没有毛，就不会有这十年的浩劫，别人弄出的动静不会这么大。阎淮关于毛的早年经历，造成的心理特质的分析令人折服，特别是毛的想当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和民粹主义给人印象深刻。

但我始终有个疑问：为什么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到进城、直至进入水晶棺，就没有一个人能挑战得动毛的权威，在毛的面前都如螳臂挡车，或如蚂蚁样被碾死。就因为他是“千年不遇的雄才”？这样的雄才不出才好，他使中国至今还迂回在河套里，不能汇入自由民主的世界发展潮流之中。

▲ 刘尚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素是全国人民对毛无限的崇拜、感激、惧怕、敬仰。建国初期，工农翻身，老革命终于进城鸡犬升天，知识分子离开了腐败国民党，换人做做看，大多数人都是感谢毛主席，钦佩毛主席。接着一年一次运动，一批一批地整肃，其顶峰是反右派，及其株连政策，终于形成寒蝉效应，领教了政治可以搞“阳谋”的威力。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是文革初期红色子弟的红色恐怖，这是17年运动中少见的恐怖。我想文革的疯狂就这样造起来了。众口齐声忠于毛主席，自杀前也要记得留言我绝不反毛主席。十亿人可能有十亿个原因投入，但这种疯狂是十七年一天天积累起来的。

▲ 李友才：“北方刮来共产的风”。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使“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

于是共产党就拿起枪杆子。

但蒋的脑子是清醒的，他一辈子以共为敌，必欲消灭之。或因鼓励湖南农民的痞子们杀地主劫财产、到小姐少奶奶的床上滚一滚刺激了他，知道总是个祸。共几次九死一生，毛带

领走出了险境。因此，毛是这帮人的救命恩人，再加上毛起用亲信，最后这个集团的成员实际上都成了他的奴才。

这就是答案。农民的答案。刘项原来不读书。

▲ 阎淮：@王嵩梅？，试答疑。

侃抽象理论累了，聊点具象实践吧。毛说，我的书，最值得看到的，是《实践论》。

北看斯大林，南瞧波尔布特，东睇金一二三，西窥齐奥塞斯库家族，小小的明灯霍查更如此；哪一不暴君？

列宁的“领袖论”，早露端倪！

▲ 郑春湖

毛泽东的政治抱负，或说他的理想主义，他的乌托邦，在他的诗词、语录和多次讲话中早已表达得非常清楚了，那就是要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五十年代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促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表明毛泽东和他的早期战友们不但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对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高度共识，高度一致：那是在经济上是消灭私有制，全面实行公有制；政治体制上一党制，而且是领袖高度集权的一党制。

然而这场人类空前规模的共产主义大试验带来的结果是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严酷的事实使绝大多数毛泽东的战友们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尊重知识分子、尊重民主党派、党内应当实行民主制等主张的呼声强烈。此外，长期掌握只对上级负责的权力，官僚队伍贪腐日益严重，对许多官员来说，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理想远不如运用手中的特权来得实惠。

唯独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不改。当然，这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的地位与他的战友们完全不同。其实，早年的战友关系早已转化为上下级关系、君臣关系了。毛泽东对官员作风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他们都以焦裕禄为榜样。当然，毛本人的特权是无限的。领袖嘛，哪能和臣子一样。

更令毛泽东无法容忍的是，刘少奇书记处一伙已经成了气候，个个都是当官作老爷，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书记处和北京市架空自己，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甚至就连中央办公厅都敢对自己搞监听，自己的私生活都无秘密可言了。

让毛泽东不搞文化大革命，行吗？

▲ 李仕林：在那种政治体制下，毛个人独裁很方便，制约很难。

毛的个人意志很容易转化成党的意志。

▲ 黄安妮：犹如以前把毛犯的错误和毛思想要区分开来一样，毛思想永远是伟光正，毛的错误不属毛思想，这样的狡辩过去有，现在有，这叫不讲理的常有理。

▲ 谢佑文：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要看他真实的内心想法，也要看他思想和决策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从正面理解毛，他有理想主义情结是没错的。他确信自己是一个无私无畏为穷人翻身为中国崛起而不怕任何人的大英雄。但许多他决定做的有关国家建设大事情的效果正好相反，他却把责任推给具体执行者。这些执行者确实有问题，思想觉悟、品德都有不少问题。要做得令毛满意确实不易。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是办不到的，是相悖的。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的人。帝皇情结是肯定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也是肯定的。想法脱离实际，偏执，顽固不化也是有依据的。痛恨中国旧式文化人也是肯定的。对中国进步繁荣和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严重后果大家也有目共睹。

▲ 陆元吉：文革前毛泽东在党内拥有至尊地位。他既是无可置疑的领袖，更是至高无上的教主。他既拥有领袖说一不二的权力，还承担以他的思想教化万民的职责。后者使他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独裁者。而他自己对后者也更为看重，说到“四个伟大”讨厌时，唯独愿意保留“导师”头衔。可见，他对此是特别在乎的，并流露出当仁不让的自信。为何毛对此特别在乎、特别自信？这就不能不追溯历史。

共产革命在中国发轫之初，仿效的是俄国革命，即以俄为师，这是顺理成章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列宁在城市发动工人革命取得成功，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第三国际当然也以此指导中国革命。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屡屡失败，碰得头破血流。革命领导者们反思再反思，争论又争论，却始终莫衷一是。毛进行了潜心思考，在自身政治生涯的低落期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弱小，但农村的贫苦农民有千千万万，他们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要发动他们起来革命，要把斗争的重心放到农村。这一结论显然违反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农民如果成为革命的主力军，那还谈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小生产者的农民吗？这样的革命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什么本质区别？毛的高明在于：这一论述虽然不符合马的基本教义，但却仍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更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就足够了，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的共产党人中，确实只有毛对社会的洞察最深刻，也只有毛敢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突破（篡改？修正？）。此后，中国革命正式变成一场新的农民运动，但中国革命也从此开启了新的局面。毛组织起以农民为主体的暴力革命，目的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建立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这是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目标（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正是马主义中最有害的部分）。因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荒谬的悖论。这种根本性的自相矛盾也影响了后面的历史进程。但不管怎么说，政权到手了，革命成功了，而这全是按照毛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毛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党的领袖兼教父。从此毛再没有战友和同僚，有的只是下属和学生，周、刘、林等概莫能外。

1949年后毛空前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能力自信），他要以自己的理想为蓝图，大刀阔斧地改造国家，改造人（后来看得更清楚，毛的理想违背基本规律，属于乌托邦的空想）。他以撞墙拆墙的勇气一往直前，他以铁腕排除阻力，而不论阻力来自何方。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企图实现“理想”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即在改造国家、社会的同时改造人。最后却付出了惨痛代价，以失败而告终。但毛并不认为自己的理想蓝图有问题，而只是归罪于下属的理解和执行。这次失败并没有动摇毛的领袖地位，但教父的光环却蒙上了阴影，“学生”居然敢于怀疑“导师”，这在他看来是最大的不忠、不敬，也是他最无法容忍的。因此，不久后新一轮的造神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兴起，只是这一轮的造神推手由刘换成了林。文革前造神运动已卓有成效，教主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小红书成为全民教科书和红色圣经，最后更达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顶峰。一场空前规模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领袖和导师的亲自发动下终于拉开了帷幕。

▲ 郭绍华：文革前历次运动杀人无数，整人无数，毛早已立威，不听话的下场就是彭德怀、高岗及成千上万右派的下场。文革前毛早已在各方面积聚了力量，甚至赌上了自己的人生。在万众山呼万岁的时候，只有“诺诺”才能活着，否则就会被“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不管你身居何位也只能由着毛把中国做实验，把人民当小白鼠。文革是毛的最后的实验，反思文革不否毛是说不过去的。当然，那些主动，甚至变本加厉的人也不能免责。

▲ 严晓江：闫淮，我认真阅读了你的文章。在我看来，在你的文章中存在许多商榷之处。

没有毛泽东也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必无“此文革”，共产党……只要搞土改，年轻农民就会参加解放军、中老年农民就支援解放战争，共产党“建政”是迟早之事。

没有毛泽东也有“新中国”是你对立国的成功的原因之一否定。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一个十分复杂、多种因素一定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贯穿于中国立国过程各种事件中，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在各种事件中假设毛泽东不存在，中国立国的过程是怎样，历史延续到何时，你是否能够圆自己的结论呢？你将中国立国是中国特有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历史结果归结为农民土地问题，你是否认为立国中那么多的复杂事物，那么复杂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条件下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只此一个问题的解决就都能迎刃而解呢？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没有假设的空间。历史只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唯一结果。如果以假设研究历史那么可能有多种假设。用数学的语言来说，社会历史事件是一个多元变量复合函数的结果。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可以用极少的变量表达。如果将历史函数的某个变量取消，那么同时也取消了这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因此，这个新函数结果可能是无解，或多元解，或不确定解。而立国是一段具有时间顺序的许多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最终体现。因此我认为，你的必然性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中国，且只有中国”发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呢？只因中国具有“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文革是对十七年国家体制的否定。但是晚年的毛泽东就是中国国情的产物。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提出的理想国与他建国初期的理想国相差甚远。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中国国家体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文化，国家的理论状态，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各种国际事件。这些原因制造了反对十七年形成的国家体制的领袖。文化革命是中国多种国内外因素造成的。毛泽东只是文化革命发生的一个充分条件，不是文化革命的唯一充分条件。

◆ 吴学民：文革不仅仅是毛发动群众砸烂国家机器。如果只有这一点，那确实没有毛就不会有文革。因为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做。但文革还有其他的特点，比如个人崇拜、不讲法治讲人治等，这在当今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的。

▲ 傅鸿平：毛把中国人民从一个黑暗带到另一个黑暗中去，不幸的是这个黑暗更难挣脱，因为他建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内实行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的集权社会！无数的运动，数不尽的斗争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草芥人命。不到三十年间没有任何外来入侵的战争就有近亿的黎民百姓死于非命。多么残酷的社会现实！所以什么三七开，什么建国有功统统都是对他的粉饰！

▲ 韦福强：@阎淮，为你的演讲叫声好！

毛只能利用人，一段时间利用这个人，另一段时间利用另一个人。这就是他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 崔元浩：文革实质上是毛利用体制外的迷众将原体制变成了超越希特勒的法西斯蒂独裁体制。直到1976年体制外的迷众才苏醒，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 高学筠：毛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是要反修防修吗？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是要进行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吗？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是要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吗？不是，都不是！一切冠冕堂皇的说教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搞的最后的运动，他搞的所有的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巩固他的统治权力，确保他的统治地位。之所以运动不断，一直到搞起文革，主要原因有：

第一、毛究竟是怎样上台的？一直以来沿用的都是根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的决议》所做出的结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的领导下逐步取得了胜利。实际上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是全党的领导，确定的是总书记是张闻天，军事领导是周恩来，毛只是周的协助者。凡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谁也不会忘却。这真实的历史成了毛的心病。他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有人不服，担心有人会拉派结党，以撬动

自己的座驾。为了防止这个软肋被人掐拿，他以攻为守搞运动，运动接着运动，整宗派主义以整治对手。

第二、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懂得不多，没说清楚过。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治国的思想资源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文革中的“五·七”指示，提出学军、学工、学农，也能说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误区。人类社会的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划时代的进步，怎么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阶段”又倒退到几万年前的不分工阶段了。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文革中“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更是空前绝后的昏作，连社会主义都不明白就不用说其他了，怎么能充当进入到共产主义领导呢。

第三、不懂经济，不懂社会管理，建政初期，完全照抄照搬前苏联的一整套做法，勉强过得去。1958年，另起炉灶，大干快上，搞了个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号称“三面红旗”，结果是大饥荒，全国一派萧条。接着，为了转移人民的关注目标，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漂亮口号的鼓呼中，整起了劳民伤财“三线建设”，其结果早已为历史证明：高投入，零产出，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

第四、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波匈事件等共产党国家的突发事件，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及其本人，更感到权位不稳。

第五、生性多疑，封建皇权思想根深蒂固，贪权恋权，不但自己要终生大权独揽，还要和过去的皇上一样，代代相传，所以刘少奇不能传，林彪也不能传。

（原编者注：在本文讨论中，除了重点讨论了对毛的评价等话题外，还热议了历史决议的“宜粗不宜细”、谁在搞历史虚无主义等话题。）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人物追踪】

### 试论“阎淮现象”

• 张 比 •

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的出版，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并引起了热议。

阎淮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早年先后毕业于北京101中学和清华大学，文革中参加过保守派红卫兵，毕业后当过工厂副厂长，煤炭部副部长秘书，中组部青干局干部，康华公司高管，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走，短期参加民运后，成为政治学者。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不去接革命的班，也不去经商发财，却深刻反思了中共建政的得失和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曲折，除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外，又推出了这部“另类”的人生回忆，实在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现象。笔者作为阎淮的中学和大学校友，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走轨迹和思想变化，阅读他的近作后，将他近年来的表现和在海内外的影响，称作“阎淮现象”，并对此略加评论。

#### 一、什么是“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表面上看，是一位红二代，前“吏部主事”，披露了中共考察、选拔、任命干部的内幕，顺便涉及了中共高层如陈云、薄一波、江泽民等以及他们子女的不为人知的诸多轶事，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而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们，又看到了他与多数红二代不同的“另类”表现，以为是一种特殊现象。

但是，这都只是看到了表层。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看他与众多红二代的不同的表现，分析他的思想与行为特质。

老一代革命者的子女，除少数出生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外，多数出生在40、50年代。他们的表现，也多数从文革开始，活跃于文革后。就其职业和最终追求来看，可大致分类如下：

专心科研型：如彭士禄（澎湃之子）、聂力（聂荣臻之女）、杨为民（北航教授、杨秀峰之子）、顾逸东（中科院院士、顾准之子）

文学艺术型：如谢飞（电影导演，谢觉哉之子）、张郎郎（画家，张竹之子）、贺捷生（贺龙之女）

从军接班型：如贺鹏飞（贺龙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许延滨（许光达之子）

出国谋生型：如宋彬彬（宋任穷之女）、林梅梅（林枫之女）

经商致富型（体制内）：如孔丹（孔原之子）、王军（王震之子）

从政接班（安全型）：如俞正声（黄敬之子）、李铁映（李维汉之子）、刘延东（刘瑞龙之女）

从政接班（野心或贪腐型）：如薄熙来（薄一波之子）、郑光迪（周恩来秘书杨刚之女）

受牵连失意型：如林彪女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子女

民主自由派：如胡德平、胡德华（胡耀邦之子）、陆德（陆定一之子）

由于未做大数据统计，无法得出以上各种类型占的比例。但显然，最后一种类型所占比例是很低的。

阎淮自然可归入此种类型，但他又与里面的多数人不同，一是他曾经在文革中与孔丹一流表现类似，都是保守派红卫兵，而文革后十几年又从政且比较顺利，用江核心的话来说，就是党对得起他。如果他不离开中组部，应该还有上升的空间；如果他在康华公司不走的话，也可进入经商致富型。

但是他却在政治风波后愤然出走，又在此后成为海外政治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行体制进行了多方位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著，可见，他的特征是幡然觉悟，彻底反思。

由此，可以说：“阎淮现象”，就是一种被原有体制培养并在原有体制下受益的“红二代”，脱离原有体制并进行深刻反思，而向人类普世价值回归的思想文化现象。

## 二、为什么会出现“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试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

先看内因。

阎淮虽然出生在干部家庭，但其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业务干部，并非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就爱学习，爱读书。他天性善良，同情弱小。在中学里，他并未与干部子弟拉帮结伙，而是接近知识分子家庭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如他的同班同学徐朔经，父亲为因主张建立中国劳动党的清华教授徐璋本，在受到歧视不允许上大学，到房产队工作后，阎十分同情，并去看望他。这在101中学是很少见的。记得阎淮上了大学后，还在星期天回中学去掏粪，打扫厕所，虽然是在“学雷锋”，但其热爱劳动、接近平民的精神也可见一斑。文革中，他保工作组，但并未狠整反工作组的同学；清华红卫兵掌权期间，他参加抄家，但又暗中保护了中学同学郭某的家人。工宣队进校后，他刚直敢言，不阿谀奉承，所以被分配到西北环境艰苦地区。在煤炭部和中组部工作期间，他也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顶撞领导的“刺头”。此外，他在文革后期及出国以后，读了大量古今名著和现代政治理论书籍，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从人性特质和知识储备来看，他在晚年大胆披露内幕，反思体制，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能力。

再谈外因。

阎淮就读的中学，虽然曾经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但在他读书期间，已经有大量清华、北大等高校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子女及附近的平民子女入学，在和他们的接触中，阎淮的平民意识在进一步增强。101中学的校长老师，也不是那种“突出政治”，不学无术的党棍，而多是知识渊博，性情温和的教育工作者。这种环境无疑对度过高中生活的阎淮有正面的影响。在清华大学，虽然老清华的传统已经保留不多，但学习理工科的阎淮，也逐步形成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文革后期，由狂热归于冷静，阎淮开始初步的反思。

步入政坛以后，虽然背后有陈云通过陈元对他一定程度的遥控，但胡赵时期的相对开明的政治，李锐等“两头真”的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真诚与睿智，无疑也感染和影响了阎淮。

促使阎淮毅然出走的直接原因还是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他身在现场，亲眼见到的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惊讶，愤怒，绝望，失去了对原有体制的幻想。

出国以后，由于各种机遇，他进入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政治研究机构，得以阅读更多的资料，接触到严家祺、刘宾雁等流亡人士和杜维明、余英时、胡志强、马英九等海外学人，方得以打通中西界限，融合最新研究成果，开阔国际眼界，并彻底放弃原有被灌输的革命与专政理念，回归普世价值。

阎淮曾对笔者说，60年来，前30年是吸毒，后30年是排毒。从他的经历看，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改变，排出原有毒素，吸入新鲜营养，就很难做到。但是，没有本身的自觉，吸毒成瘾，病入膏肓，也不可能脱胎换骨。这就是“阎淮现象”出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 三、“阎淮现象”的启示

1.读《进出中组部》，不能只热衷于官场秘闻，看大佬的密室策划，高层的勾心斗角，而要看到作者的深意。进出中组部的书名，隐含的意思是进入和离开原有的体制，进入是被动的，离开是主动的。连阎淮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都要离开，说明此体制的运转已经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前景失去信心。所以，才有了罗宇的告别总参和阎淮的脱离中组部。当然，还有许多人不愿离开，要继续在里面捞好处，逞英雄，但总有明智和有良知的人会与之

决裂。因此，对体制内的人，对红二代不能同等视之，一概认为是维护既得利益的顽固派。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觉醒，更多的阎淮出现。

2.“阎淮”现象已经在海内外，在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中产生了影响。但是，和他曾经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学校友并不认同他。他的大学校友中，情况各有不同。原清华大学红卫兵，曾经在1966年“红八月”中大显身手的“将军”好汉们，有的顽固坚持原有观点，有的虽有一些反思但沉默不语。而原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少数仍然沉迷在文革“大民主”的美好回忆中，对领袖和“旗手”情意缠绵。还有的校友派性未消，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很大精力用于揭露对方的残暴，而对自己一方的错误和自己思想上的失误缺乏反思。作为原保守派红卫兵干将的阎淮，尚且能够解剖自己，深刻反思和忏悔，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为何我们不能呢？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犯了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关键是要承认和改正，而不是继续“试错”。经历了文革的清华校友们，应当向阎淮学习，消除派性，增进团结，共同为总结文革的教训，走出专制主义思想的阴影，继续做出努力。

3.“阎淮现象”的出现，阎淮思考和阐述的新的政治理念，无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他认真学习和思考，反思旧体制之弊病，展望新时代的到来，显示了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当然，他的阐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讨论。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目前，清华校友和众多的海内外朋友们，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们，要沉下心来，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加强团结合作，继续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我们的努力和付出，不会是白费的。

~~~~~

【史海钩沉】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怎样出笼的

• 徐庆全 •

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经过毛泽东修改并特意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字眼，形成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纪要》首次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一概念，并以此清算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将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捆绑在这一概念上，统统打倒。直到“文革”结束后，文艺界人士才挣脱了这条铁链。

◇ “文艺黑线专政论”如何提出的？

《纪要》中，关于“文艺黑线”是这样说的：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几篇文章——引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不仅如此，《纪要》还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并明确地为三十年代文艺判定了性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

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样，就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扯到路线斗争上了。引文中黑体字部分，是毛泽东修改时所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6页）。有迹象表明，毛泽东作这样的修改，当时的两位“大理论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位“理论家”是陈伯达。

陈伯达没有参加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前期的修改工作，也没有参加，后来是毛泽东点名要陈伯达参加修改的。这个“座谈会纪要”在江青多次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江青请陈伯达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3月10日至15日，在江青主持下，陈伯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四位又一起讨论修改。

陈伯达看到《纪要》后对江青说：

17年（指建国17年——引者）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

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了。《纪要》中“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段话，就是出自陈伯达的“见解”（叶永烈：《陈伯达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2页）。

叶永烈写作此书时，曾采访过陈伯达。陈参与《纪要》的修改是事实。但是，说这段话全出自陈伯达的手笔，则有误。按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将“国防文学”的口号明确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这段话（即引文中的黑体字），恰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可是，在当年“两个口号”论争之际，陈伯达则不但参与其中并且是“国防文学”的坚定的拥护者。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中，陈伯达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另外一个“理论家”，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康生：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

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

或许，正是在这两位“大理论家”“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在对《纪要》的修改时才加上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段话。

◇ 为什么要在三十年代问题上作文章

毛泽东委托江青起草这个《座谈会纪要》，目的是“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而当时的文艺队伍的首领是周扬；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周扬是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以鲁迅为盟主、周扬和冯雪峰参与期间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失误，有过多少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

关于这一点，左联盟主鲁迅和毛泽东都曾有过评价。

早在三十年代初，在左翼文艺和革命作家遭受“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鲁迅就认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在“两个口号”论争时，鲁迅就指出：“‘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走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十年内战期间，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遭到了“惨败”。“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可以深长思之？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鲁迅和毛泽东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这些很高的评价，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却被有意地忽略了，因而三十年代的问题也就没法分辨清楚了。

1964年11月，彭真对中宣部的副部长许立群谈起周扬时曾提及，周扬的主要问题是三十年代的问题讲不清楚，可见中央对于周扬早有议论。在此时文化部进行的文艺整风中，“一条汉子批三条汉子”时，“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

这样的形势也给江青在三十年代问题上作文章提供了可能。

熟知江青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三十年代，江青也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员。当然，作为一名演员，在当时不免有一些绯闻流传，但从主体上来说，那时江青还是革命的。在“文化

大革命”前夕按照路线斗争的标准审视三十年代问题的时候，江青很想遮掩自己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丑闻，同时达到从历史上来清算周扬的目的。

江青首先从夏衍在三十年代写的一个剧本《赛金花》上作文章。选择这个剧本，有两个因素：

第一，掩盖自己的一段历史。1936年夏衍完成这个剧本后，作为演员的江青——当时用的“蓝苹”这个名字——非常想演赛金花这个角色。虽然江青是二流演员，但她背后有唐纳撑腰，也颇具竞争力。但是，当时大红大紫的王莹也非常垂青这一角色。双方争执不下，竟然闹到剧团分裂的地步。后来，在夏衍、章泯等人的主持下，江青担任了《大雷雨》一剧的女主角后，她才罢休。这一段历史，在江青看来，当然不是很光彩的。

第二，打击周扬。《赛金花》上演之后，周扬和夏衍等人领导的“剧作者协会”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据《文学界》创刊号上的报导，会上认为，《赛金花》是在随“国防文学”而提出的“国防戏剧”口号后“第一个收获到一个很成功的剧本”。而正致力于“国防文学”宣传的周扬，在论述“国防文学”的《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以《赛金花》为例，提出挖掘历史题材的问题：

历史的主题大部分还在未经掘发的状况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的和失败的英雄事件，有多少不曾被人描写的民族英雄。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高度。民族革命不但有它的现在，将来，同时也有它的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再评价里引出于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训。《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一方面的继续的努力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周扬和夏衍等人的看法，在鲁迅那里受到了批评。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以不屑的口气讽刺说：“作文中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鲁迅的讽刺与批评，成为江青打击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和夏衍等人的一个武器。

在文化部1964年文艺整风前后，江青将《赛金花》剧本转交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夏衍进行激烈的批判。江青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对周扬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此时，周扬也只能按照当时“左”的思想观念，将三十年代问题往路线上扯。在1965年12月召开的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周扬在讲话中，将三十年代的问题竟然上升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

有些同志还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要我们的文艺回到三十年代去，就是要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按照当时“左”的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或许周扬已经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因此，在他因为癌症住院治疗时，竟然把三十年代问题视为折磨自己的“另一个癌症”。与周扬共过事的著名学者龚育之回忆说：

他（指周扬——引者）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后来，这个《纪要》的提法，证明周扬的预感是正确的。

◇ “文艺黑线专政论”带来灾难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也是在这个月，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纪要》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

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是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

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这样，左翼文艺运动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与纷争，一概不加分析地看做是鲁迅所代表的毛泽东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以周扬为代表的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10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化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还需要指出的是，“黑线专政论”的提法在文艺界确定后，随后又被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群工作领域。这种颠倒是非的估计，成为“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个领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来源：微信号《八十年代》

~~~~~

【往事非烟】

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

• 何大明 •

最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两书相继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参加“缅共”部队壮烈牺牲的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即张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结论。而民间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动于母腹。作为当年张育海的同窗好友，抚忆往事，就证于实，当无愧九泉下之英灵。

## 一、从“八中”到“四中”

张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与八中同在西城，均为男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两校的高考升学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八中略多，故有“四”“八”的排序。四中的学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为甚。但对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则另眼相待。因为八中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报考四中的。六四年入学，我所在的高中2班，就来了三个八中生。他们的数理化成绩相当出色。六五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学一年的张育海。

当时学校实行免修制度，开辟自修室。免修考试通过，可到自修室学习其它课程。张育海因数学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他的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部唯一的两科免修生。免修数学者还有王明和程翰生。

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坛拔草，同学捡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数学老师漆土芳手中。漆老师边翻看边说：“这个同学真不错，数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学的计划，英文的微积分已学了。”后来才知道笔记本是张育海的。

张育海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打球、游泳、拉小提琴、看话剧，有时还爱在黑板上画几笔。他常去看篮球，对钱澄海与杨伯镛的配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沈大伟还模仿北京排球队陈文智的“平拉开”。他对北京“宝三”与天津“红桥”的攒跤也很感兴趣。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英求学，解放前因车祸身亡。其母在某大学管图书。因其母的三叔许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张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军干部，二哥清华毕业供职保密机构，三哥在清华上大学。文革前，起码有两个哥哥入了党，唯独这位“小四儿”连团还没入上。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干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

当时中学界的“阶级路线”贯彻得参差不齐。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前景愈发不能乐观。北京中学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变化，是文革初期“对联”大辩论演就“红八月”的诱因。

八中来的学生对我的接近与友好也有一点诱因。我的堂叔爷爷何继麟（其父曾为北洋政府森林部长）解放后一直在八中担纲历史教学，他那点“公子哥”的潇洒不羁与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派”委实给几位八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爱屋及乌，把不相干的我与那位何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 二、四中“高二2”与“对联”辩论

六六年六月中旬，张育海在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看到“兰州告急”的大字报，回到学校就与吴景瑞商议怎样去“声讨李贵子”。班文革领导不同意他们去。他们觉得学校里的

运动“太没意思”，只坐等当“团结对象”，就与高三2班的沈大伟相约，凑了些全国粮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联的首都中学生。七月中旬，他们回来，因撤工作组问题引发的“对联”大辩论近在咫尺。

三十二年之后，当我看到由牟志京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只把春来报》上的《论出身》及刊登在《兵团战报》上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由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镔等人撰写）三篇文章被当做批判“对联”与血统论的三种不同思潮而立论为文时〔1〕，惊诧历史的缩影竟会如此之小。这需要对文革时的四中高二2班和在班上进行的“对联”辩论进行一点历史回顾。

高二2班是四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因在四清时批判“反动学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虽是无“劣迹”的知识分子，但奶奶辈总能挖出些问题。牟志京因在“写日记”向团组织交心时描述了他奶奶带他到大连指看祖产的情迹，被描绘成电影《槐树庄》里地主传地契的接班人；这俨然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活报剧。批判会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只是奶奶“随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与天真大概从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文革伊始，他虽被定为“右派”学生，但还积极投入运动。八月一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对联”辩论，在一群“让反动观点暴露”的红卫兵的围护下，上台发言说“对联”是反动的，是要把“黑五类”子女推向敌人一方。我“参观”了音院的大辩论。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刘诗昆和邓林。牟志京回到班里，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时还要激烈的批判。牟志京坚持己见，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各类出身的同学唾骂。这时，杨百朋、吴景瑞和刘大猛三个“八中生”先后表示“对联”是错误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宝臣起而支持杨百朋，铸就了他们日后的友谊。以许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镔为代表的“中间派”提出了说理性的异议，实际上给“对联”予否定。他们的家长则为党政军的一般干部。而蒋效愚等同学奋力攻击牟志京，以示自己对红五类的支持。这就成为推行“对联”的对抗性阵垒，而在一般场合很少有这种状况。

张育海被迫表态。八中来的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革弟”的表态令班上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不同观点的同学竟然以“混蛋”对“混蛋的平方”及“混蛋的立方”等来骂对方，使得“辩论”无法再进行下去。

“红八月”抄家风一起，班上的红卫兵即跑到张育海在钱粮胡同的寓所门前，贴上了“红大爷到此一游”的标语。

大串连随北风呼啸而中断。同学们回到校园。正值《出身论》油印件四处张贴之时。四中一高二2一牟志京等人反对“对联”和其后的办报活动，成为遇罗克政论生涯的温床。

### 三、《论出身》前后事

六六年十二月，张育海、李宝臣和杨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组，油印《敌敌畏》小报，编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论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志京义无反顾，办起了《中学文革报》。我多年的足球伙伴王建复邀我参加，但牟志京的条件是必须“完完全全”拥护《出身论》。是晚，我从包括毛宪文老师和遇罗文在内的四中语文教研组小屋内退出，正好碰到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参加了“敌敌畏”。

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写的《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和《论出身》。清华“五四”的文章当时在社会影响不小，但远不如《出身论》。有人抄成大字报，贴到平安里东墙附近。人教社用老五号字排好，但未排《论出身》。我们看一下子不上两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学写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朵颐。

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

《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论出身》的刊出，使我们“净”剩下六个人。加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和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的帮忙，一时节大家神气十足的地过了一把“卖报瘾”。《中学文革报》被人争购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但社会反响远不如“牟元帅”他们之所得。王建复一次得意地对我说：“‘小组’本想批批你们，看我们的面子，算了。”“小骂大帮忙”，我没有记忆是谁讲的。但活跃在四中校园的“祁念东”（他在1970年调查孙立凡、邢泓远一案时还特别关注张育海、沈大伟、吴景瑞的“出走”）虽持有《红旗》的记者证，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我们也没有向中央首长传递报纸，虽然我们也听说，中央政治局用多大号的字印了《出身论》等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论出身》无法与《出身论》相比。

#### 四、“联动的骚乱”引起的困惑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刊登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联动”的骚乱》）给我们几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孙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学同学。因近邻使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开始前，我能享受到孙公社会地位带来的娱乐活动之大半。当然，孙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学生办的小报给孙公看。我还能记得孙公看了《“联动”的骚乱》一文后的惊异目光。1980年孙公来青岛见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罗克……”。当听我回答“遇罗克这个人我不认识”时，孙公的惊讶也不亚于当初。遇罗克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写的文章。

《“联动”的骚乱》一文给社会带来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人说牟志京要办“中央文革报”了。

在沈大伟家，张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彻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组”的文风与笔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高干子女题材的捕捉，恰到好处；对“打雷”，“读血书”等文艺作品的揶揄，让人拍手称快。当时，受毛泽东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青年学生很难摆脱主体意识来探讨问题。“对联”的拥戴者当年一提起“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就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若看到高干子女的“特权”生活，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到来。而“特权”问题的讨论，又和首期《只把春来报》刊登的清华“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难怪我们兴奋与跃如了。

吴景瑞提出，下一期与《中学文革报》“合”，并声明坚决拥护《出身论》。张育海则说：《出身论》的问题已不重要。探讨“联动的骚乱”才是“问题”之本。所谓“第五研究小组”本是戏称，但真要探讨起“社会”来，我就不大能够接受了。

我的复杂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是右派，被开除出党，母亲尚在党内）和对高干子女的了解与接触使我语出有焉，正经八摆地给大家分析了“形势”，即这帮“老红卫兵”将来还要掌权。造反派的奴隶主义太重了，“一发做”，拱手让权。保自己的事迟早会发生。吴景瑞问：“真那么悲观？”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诚，被《出身论》作者那潇洒而又锋利的文风扯动了的激情得到了缓解，与《中学文革报》“合”的念头再无人提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陞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而“联动的骚乱”问题却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

最近有人提及遇罗克的死因问题（2）。我总以为，单凭《出身论》不足被砍头。搞“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不会对牺牲品的呻吟怒发冲冠。

我想，“季孙”之忧，即“骚乱”也。“庙堂之事，与你何干？”夜深人寂，纷乱中人看纷乱事。“斩立决”的事不提也罢。“此之谓也”的笔法给人以相当的刺激。到如今，还是个谜。

## 五、余下的话

英雄的社会美往往悲壮。就其本质而言，挖掘的时间，有时会很长很长。

陶洛诵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遇罗克（3）。其中有“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一节。读后令人神往。

一群小小“报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在蒙蒙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后到达金顶，看到了云海、日出和宝光，而背对着大雪山。大自然给予年轻人的洗炼与抚慰，是多么

好的文学艺术主题。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们摆脱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来。

我们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可能被逻辑思辩的浆糊淹没了。以致至今没有见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称得上的话。但终于有了北岛在一九九三年瑞典的落选，将王蒙与王朔挤到了“另类”。雨中峨嵋的感觉，很不易被人觉察；如同当年《中学文革报》诸君被戚本禹讲话的阴影所笼罩一样。

在投宿报国寺的夜幕中，我向牟志京、遇罗文等人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你们做了件大事，这件事有多大，我也说不清。但你们做了。可能我们中人谁也做不了这样大的事了。希望你们别后悔。牟志京回答：我们有什么后悔的？

今天我语得其所，并非想证明自己的洞察力，只因为事到如今我对遇罗克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陶洛诵身边经过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志京、吴景瑞、赵京兴和赵振开（北岛）等，足以贯通一部文革的民间思想史。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影脚本。

张育海与李宝臣没有登峨嵋山，在家筹办第四期《只把春来报》。按我的话说，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吴景瑞在金顶表现出特有的激动。看到宝光里的人影在动，他大叫：“快跳下去吧！这趟来，死也值得！”下山后，他和牟志京去了凭祥，越境后被送回。六七年九月的一天，他只身离京，从此再无音讯。

遇罗克被捕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才明确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

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前，张育海只身赴滇，不久就传来他参加“缅共”的消息。沈大伟在初夏也到了瑞丽。后来，传出了他们先后牺牲的噩耗。

别事无论，《只把春来报》编辑部成员在文革中的死亡率与同类小报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张育海入缅参军后，曾接到过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经张育海的哥哥转给我。我接到信后，很快就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就摘录信内容的五分之四，复写后寄给了内蒙插队的任志同学和山西插队的刘捷同学。经刘捷传抄，在祖国南北东西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坚决否定，引发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若有可能，只将原件发表，即可让人拥抱张育海那颗赤诚的心。

缩小的历史镜头还应扫描到老一辈。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张家妇孺的许德珩先生和我认识多年的孙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文革之后，承佩老人为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竭尽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张育海。

告诉张育海的事应该还有一件，就是他的恋人，即那位高个子，人也漂亮的女学生。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与张育海相爱。但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后，一直以张育海女友的身份奔

波于市区与清华公寓，配合张家哥哥，细心侍奉患脑血栓偏瘫的张伯母。她告诉老人，她在等张育海回来。

谨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向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

回来吧，我们的育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二〇〇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刘捷

注释：

〔1〕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印红标文《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2〕参见《遇见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牟志京文《〈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及《文汇报读书周报》1999年2月6日郑也夫文《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3〕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陶洛诵文《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 原载《二闲堂》网站

~~~~~

【亡灵祭坛】

长矛刺入头颅七厘米——人民大学沈士根同学之死

• 李豫生 •

在1968年5月22日那次血腥的武斗中，有“新人大公社”（当时学校一派组织的名称——原编者）的3名同学当场被刺死，他们是陈荣祖（计划统计系）、廖金妹（农经系）、杨大志（农经系）。还有一位同学是经济系四年级的沈士根，他被对方长矛的矛尖从右眉框骨刺入颅室7厘米，形成血肿，以致瘫痪。一年多后同学们毕业离校，他由于自己唯一的亲属——同父异母的哥哥的不耐烦护理而死亡。

工军宣队进校以后，曾对武斗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始终未能有明确结果。“究竟是谁当场刺死了同学？”——成为人民大学文革的永久悬案。尽管有千万条理由把发生武斗的责任归结于文革发动者头上，但是，还有“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呢？那些下狠手刺死同学的人，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虽然你们逃过了责罚，但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难道你们就没有扪心自问过？你们的良心安宁吗？

沈士根同学原本就是残疾，他的右眼失明，装的是义眼。可刺人者偏偏刺的是好眼——他的左眼！有人说，刺人者是认识他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记住了7厘米这个数字。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如果双方都是直立状态，长矛挺刺过去，一定是刺中胸腹，而对方瞄准的却是他的头部。长矛刺穿了眉框骨，直入颅室7厘米，下手是如何的凶狠毒辣！长矛是用钢管打磨而成，矛尖打磨得如此锋利，内心该藏有何等的仇恨？！而当时争来抢去的，无非是证明谁比谁更革命一些而已！

5月22日这天，我是和一些同学一起送沈士根去医院的。当时我住北一楼，忽听到前面人声鼎沸，就急忙跟着一些人往后面的交通股跑。我那时是三黑人物——黑帮子女、铁杆保皇、资反路线执行者，高音喇叭里天天高喊“黑帮子女×××、×××挑动武斗”，我哪

里还敢往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在校园里走路也怕有飞来横祸被人抓去。和同学走路是一前一后拉开距离，以防一起被抓，侥幸以为如果前面的人被抓，后面的还可以跑去通风报信，找人解救。我当时往交通股跑是想参加救援。

那会儿的交通股有一个门洞，我就站在那儿伸头张望。一会儿就看见有滴着血的同学被抬了下来，凑近一看，是沈士根，我认识。沈士根是经济系四年级同学，校文工团舞蹈队的成员，和我熟悉。当下顾不得什么，赶紧坐进一辆轿车的后排，叫同学们把沈抬进来担在我的腿上，由我抱住，直送积水潭医院。

当时的沈士根脸上有血、已经失禁，但还有意识，口里喃喃的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宋玉华……宋玉华……”宋玉华是经济系二年级的女同学，团支部书记，和沈士根是上海老乡，平常谁也不知道沈对她的心思，在这个频危时刻竟然流露出来。

汽车飞快地开到了积水潭医院，外科急救室位于地下，东一堆、西一堆的都是“新人大公社”受伤的同学。有的伤势轻一些，比如朱卫卫，包扎一下就可以了。当我看到廖金妹同学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冰冷的地下，死去了。

医生最初给沈士根检查伤口，似乎伤得不甚严重，只是在左眉框骨的位置有一个1厘米多一点的小创口。医生清创以后就把表皮缝合了。由于是局麻，沈士根并没有丧失意识，我们不停地叫他的名字，他都能应声。等他到病房里休息下来，我叫人赶快去找的宋玉华同学赶来了。宋玉华同学就近招呼沈士根的时候，他已经没什么明显反映了。

当晚，我和余景清可能还有他们班的王曙光同学就一直在那里守着，过一会儿喊一声沈士根的名字，开始他还能答应，到后半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就没有应声了。我们赶快找医生，再次检查抢救，经拍片检查才发现，有一个深入颅室7厘米的创口渐渐渗血血肿，压迫脑干，伤情危重了。

沈士根后来是转到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做的手术，当我再看到他时，他的左额已经锯开了一个约5×5厘米的大洞，装上了有机玻璃，便于随时再做手术。这种手术方式当时很先进，就像当时的英雄人物麦贤德的手术一样。

沈士根被接回学校后，瘫痪、失语，但认得同学、听的懂同学的讲话。“新人大公社”的同学精心护理他，同学们轮流值班，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周身擦拭的干干净净。党史二年级的郭建成同学会民间伤科医术，每天把他背在背上自己做跳跃运动，帮他疏通经络。

每次治疗下来，郭建成同学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在同学们的护理下，沈士根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到邻近分配时，他已经气色很好，能端坐在轮椅上，笑着听同学们讲话。

毕业分配是沈士根又一次厄运的开始。他是个苦命人，家境贫穷，上大学穿的衣服还是由家织的土布做的。老家相依为命的老娘含辛茹苦地把他培养到大学，没有等到他毕业就已过世。在上海他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感情疏远。

同学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人能来照顾他了。沈士根被送到上海的时候，只有“新人大公社”给了很少一点钱，可想而知他的兄嫂怎么肯尽心照顾他？

最后一次见沈士根，是我1970年分配工作后到上海的时候，沈士根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极度消瘦、满身污垢，见到我和老余走近，浑浊的眼睛流下了泪水。他不住地用头向下撞藤椅的扶手，意思是告诉我们生不如死。我们无言以对，也不忍再看下去，只能逃一样的走掉了。

这次不久，沈士根同学就去了。

写于2017年6月17日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